

# 外语教材思政建设研究:文化分析内容、方法与理论视角\*

广州大学 杨冬玲 汪东萍

外语课程思政探索

**摘 要** 教材建设是课程思政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建设内容。外语教材蕴含的文化要素影响学习者个体的语言社会化过程,更关乎意识形态等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广义的文化内涵与当前课程思政的重点建设内容高度契合,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然而,国内对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文化内容的理解主要处于现象解读阶段,亟需更加系统化和结构化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文章基于文化的概念内涵和外语教材实证研究常用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构建了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并介绍了语言教材常用的内容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方法。最后,提出了应对外语教材文化分析、文化教学和外语教材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需要重点处理的四对关系。希望本研究能为外语教材研究者、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提供文化综合分析视角和方法,为外语课程思政实施提供基础保障和内容供给,促进课程思政的实施。

**关键词** 外语教材 文化内容 分析方法 文化教学 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22)03-0016-0007

## 1 引言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提出,教材建设要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育人功能显著增强,开创教材建设新局面。国家高度重视教材意识形态建设,与课程思政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导向一致。教材是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环节和物质保障,也是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未来重点建设的方向(陆道坤,2022)。外语教材是外语课程和思政内容的重要载体,是外语教学的根本依托(孙有中,2020;刘建达,2020)。把教材建设纳入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之中,是在内容源头上有效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起点。教材的文化研究从内容构成和学理基础方面为教材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文化建设的思路 and 路径。

教材不仅是课程产品,也是文化产品(Graves, 2019)。外语教材的文化要素不仅影响语言学习者的个体社会化过程,而且关乎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和国家战略利益。外语教材的文化内容在学理和研究内容

上与当前课程思政要求将“价值观引领寓于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中”,落实“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契合。

近30年来,教材逐渐成为应用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教材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观念:语言教学工具观和价值意义载体观。前者以评价教材语言对语言教学的作用为主要目标,后者主要通过对教材呈现内容和设计的研究来分析教材表达的多元意义,旨在揭示语言教学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价值观念和实践行为(Weninger, 2018)。过去十年,国外对外语教材的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分析的内容构成、不同分析工具的应用以及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对外语学习者个人成长和国家安全的的影响。国内外语教材研究仍然以遵循语言教学工具观为主,聚焦于教材评价,重视教材语言项目的系统化分析,对教材价值意义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近两年开始出现外语教材文化研究(张虹,2020;郭宝仙,2020),但是对外语教材蕴含的文化内容的理解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文化内容分析方法也相对单一。为解决我国外语教

\* 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 \*

育者、外语学习者和教材编写者共同面对的文化教学“教什么”和“如何教”的困惑,促进外语课程思政文化育人的实施,本文借助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实证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外语教材文化内容的内涵和结构关系,构建了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层级框架。本文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从文化内容构成、分析方法、理论视角、外语文化教学及教材文化建设面临的相关挑战等方面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①外语学习者在语言教材中通常接触并学习什么文化内容?文化内容内部和外部是否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外语教材选择呈现特定的文化内容的主要依据是什么?②可以基于何种理论视角、用什么方法来分析外语教材中的特定文化内容?③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教材文化建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2 外语教材分析的文化内容

### 2.1 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内涵丰富而复杂,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学界对文化的界定尚未统一。Kramsch (1998) 指出,文化是存在于共同社会和历史时空的,是某一话语社团成员在感知、相信、评价和行为方面遵守的共同的准则体系。Cortazzi & Jin (1999) 认为,文化是包含观念、预设和信仰的框架,根据该框架可以分析和理解他人的话语、行动和思维模式。虽然 Kramsch 强调文化的群体性、社会历史空

间和时间维度以及共同行为标准等成员共性特征,Cortazzi & Jin 强调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互动传播特性,这两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外语教材蕴含的文化内容特点保持一致。

### 2.2 外语教材研究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

综观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实证研究,发现根据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文化分析框架。本文整理了 SSCI 收录的实证研究经常采用的七个外语教材文化分析框架,具体内容见表 1。

通过分析表 1 中不同文化内容的具体内涵,本文将这些分析框架归纳为三个层级范畴:类型、维度和主题。

类型是文化的分类,属于相对宏观层面的文化内容,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文化进行了不同分类。Cortazzi & Jin (1999) 提出了语言教材中文化信息的三种来源:目的语文化、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以英语为例,目的语文化指英语是公民母语的国家的文化,如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等;母语文化指英语学习者所讲母语的国家的文化,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国际文化指世界范围内除了英语及英语学习者母语国家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等。

Kachru (1992) 按照区域分布将文化分为三类:内围圈 (inner circle)、外围圈 (outer circle) 和外扩圈 (expanding circle)。以英语为例,分类标准如下:英语是官方和/或通用语言,也是大多数居民的母语的地区

表 1 EFL 教材文化分析内容

| 学者(时间)                   | 文化内容                                                                                                                                                                                                                                                                                                         | 层级范畴 |
|--------------------------|--------------------------------------------------------------------------------------------------------------------------------------------------------------------------------------------------------------------------------------------------------------------------------------------------------------|------|
| Cortazzi & Jin (1999)    | 目的语文化(target culture)、母语文化(source culture)、国际文化(international culture)                                                                                                                                                                                                                                       | 类型   |
| Kachru (1992)            | 内围圈(inner circle)、外围圈(outer circle)、外扩圈(expanding circle)                                                                                                                                                                                                                                                    |      |
| Stern (1992)             | 大 C 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小 c 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                                                                                                                                                                                                                                                  | 维度   |
| Moran (2001)             | 产品(product)、实践(practice)、视角(perspective)、社团(community)、人物(person)                                                                                                                                                                                                                                            |      |
| Adaskou et al. (1990)    | 美学意义(aesthetic sense)、社会意义(sociological sense)、语义意义(semantic sense)、语用意义(pragmatic sense)                                                                                                                                                                                                                    |      |
| Byram (1989)             | 人物身份(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group)、社会交往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信仰和行为(belief and behavior)、<br>社会和政治制度(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社会交往和生命周期(soci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民族/<br>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刻板印象和国家身份(stereotyp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 主题   |
| Dweik & Al-Sayyed (2015) | 历史与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生态(ecology)、休闲时光(leisure time)、音乐与艺术(music and the arts)、<br>姓名(names)、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家庭与性别关系(famil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hips)、<br>教育(education)、食物饮品(food and drinks)、宗教及仪式(religion and religious rituals)、经济(economy)、<br>服饰(dress)、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 |      |

注: Byram (1989) 和 Dweik & Al-Sayyed (2015) 的“文化内容”一栏中加粗字体是大 C 文化,非加粗字体是小 c 文化

被称作内围圈,也称为 ENL(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地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英语是当地的官方或通用语言,但并非大多数居民的母语,大多数居民会在母语期后接触英语,并在教育、工作中广泛使用英语的地区被称作外围圈,也称为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地区;英语不具有任何公共地位,大多数居民的母语并非英语,居民通常会在学校内以“学外语”的形式接触到英语的地区被称作外扩圈,也称作 EFL 地区(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虽然 Cortazzi & Jin (1999) 是以目标语言和外语学习者母语所在国家文化为分类标准, Kachru (1992) 从区域差异以及主流文化的视角作为文化内容分类标准,二者本质上都是以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及其文化身份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关系为分类基点,蕴含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结构关系,是基于文化内容本体之外的分类标准,属于外部分类。而 Stern (1992) 的分类是基于文化概念的内涵,是文化内容本体内部的范畴化,主要用来探讨文化范畴内文化的不同方面的结构关系。表 1 中的维度和主题都存在于文化内容本体内,涉及文化具体内容的层级分类。

维度是相对中观层面的文化分类,是介于文化类型和主题之间的具有一定概括性、较抽象的文化内容。Stern (1992) 根据文化的结构和主题范畴,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把文化分为大 C 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和小 c 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大 C 文化主要涉及人类文明层面的文化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如政治、历史、教育、经济、艺术、地理、社会制度等宏大主题;小 c 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包括人类的生活方式、日常行为规范、传统风俗等与个体关系更加密切的相对微小主题。

Moran (2001) 提出文化教学的五个维度:产品(人工制品、场所、组织和艺术形式)、实践(恰当的文化行为)、视角(信念、价值观、态度和观念)、社团(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方式,包括人际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物(存在于某文化中的个体成员)。Yuen (2011) 的文化内容框架由其中四个维度构成,阐释了四个维度的内在联系,认为文化要素是一套编码系统(产品),由不同的人(人物)用来交际(实践)和表达思想(视角)。交际或文化行为(实践)是在与他人产生各种联系(社团)的过程中实现的,与 Moran 的五维划分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倾向于采用 Moran 的文化分析框架。

Adaskou *et al.* (1990) 在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基于文化要素表达的意义把文化分成四类:美学意义(类似大 C 文化,如文学和艺术)、社会意义(类似小 c 文化,如工作和休闲)、语义意义(文化概念的意义系统,如食物和服饰)、语用意义(交际功能、礼貌原则等,如副语言、社交技能、背景知识)。Adaskou *et al.* 从表义系统的角度来区分文化的类别,符合外语教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属性,注重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关系,对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Byram (1989) 和 Dweik & Al-Sayyed (2015) 对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的分类处于相对直观的文化现象层面,是更具体、相对容易理解的文化内容。此处不再针对每一个子类别展开描述或解释,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不同的学科视角或现实需要导致对文化价值侧重点的不同理解或取向,不同学者在“主题”层面的文化分类标准也较为灵活多样。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Byram (1989) 和 Dweik & Al-Sayyed (2015) 的框架也有交叠之处,如历史和政治维度;不同之处在于 Byram 的分类主要属于大 C 文化范畴,而 Dweik & Al-Sayyed 的分类同时包含大 C 文化和小 c 文化两种范畴。

### 2.3 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

本研究建立的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包含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文化“类型”,是相对宏观的文化分类,第三层级是文化的“主题”,是相对微观的文化内容,第二层级是介于类型和主题之间的较中观的层面“维度”。对文化内容不同层次进行概括,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加深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形成文化价值判断。

图 1 最左侧,箭头方向由上而下,表明无论是在外语教材分析,还是外语教学多元素材的组织过程中,文化内容要素的析出与融入可以遵循首先从文化类型(较宏观的层次)入手,逐渐聚焦到维度,最后到主题的操作顺序。该框架是在我国社会文化语境背景下的分析框架,类型模块的两个子层级中的阴影浓淡反映了我国外语文化教学在该层级上的应然态势和未来的关注点。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例,中华文化属于外扩圈,是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加大作为母语文化的中华文化的比重,可以改变外语教学以内围圈目的语文化为主的文化要素格局,但同时也要注重国际文化所占的比重。无论是加大中华文化还是某种国际文化的比重,都需要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注重文化内容呈现的层次和占比,尤其是微观的构成要素为中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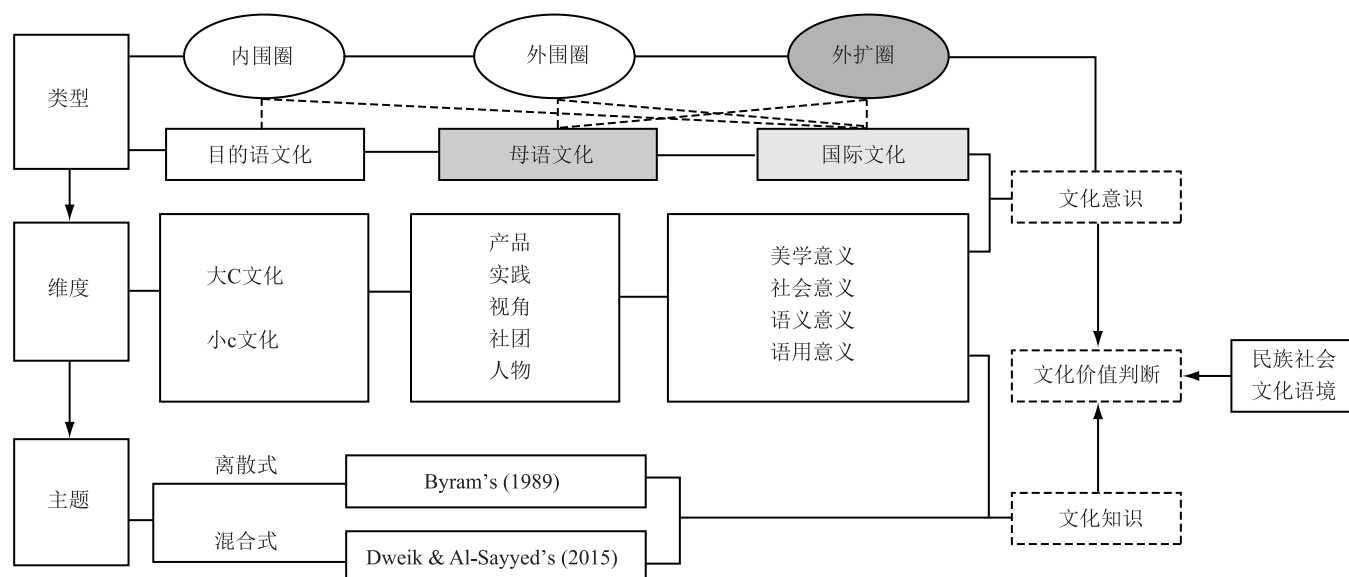


图1 EFL 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

融入外语教学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内容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题的深入研究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加大从三个“维度”分析“主题”内容,如基于体裁理论拓展对微观主题的话语意义研究,是语言学视角的文化研究需要深入开展的方向。同时,对文化内容三个层次的理解,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文化内容有较系统的把握,在系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同时结合国家社会文化语境建构动态文化知识体系,有利于教师和学习者基于文化事实和主题形成文化价值判断。另外,该框架也是一个文化内容层级清单和结构比例参照图,可以与表1一起用来考量定量内容分析的频次,也可以作为定性内容分析的参照编码。

在对外语教材文化内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一些研究已经从类型的层面来理解和分析主题,但是,鲜有研究针对主题层级的文化内容从多元维度的层次进行分析。类型、维度和主题三个层级的连接在文化内容分析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编写教材或组织教学素材时,在三个层级上考虑文化内容分布及其关系,有利于建立和传递完整而又有所侧重的符合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与国家政治利益的文化价值观体系。

### 3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方法及理论视角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分析采用的理论视角、分析框架、分析方法。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等。虽然

近年来呈现出多种分析方法整合的发展态势(如批评社会符号方法),内容分析仍然是主流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为内容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符号对象。

#### 3.1 内容分析

作为实证研究方法,教材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由量化的频次统计向质性内容结构分析方向发展。王攀峰(2020)深入研究了教材内容分析法的起源、类型、发展演变及具体操作步骤。就外语教材文化研究的内容分析法而言,其主要发展轨迹为:从以大规模文本中核心词汇或话题频次的统计为基本特征的定量分析,到对所选目标语篇话语特征的定性分析,再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法主要用于分析语言教材中不同文化群体和文化知识的不平衡表征(representation),包括文化要素构成(Bahrami, 2015; Tajeddin & Teimournezhad, 2015)、文化背景和文化呈现(Dastjerdi & Samian, 2011; Shin *et al.*, 2011; Stranger-Johannessen, 2015)、跨文化内容及其理解(Su, 2016)、文化霸权和文化偏见(Yamada, 2010; Song, 2013)以及女性社会角色分析(Porreca, 1984)等。

#### 3.2 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主要以Fairclough(1995)的理论为基础,采用系统功能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常用来揭示语言教材中不同的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的选择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Liu, 2005; Yuen, 2011; Xiong &

Qian, 2012; Wang, 2016; Xiong & Yuan, 2018)。

### 3.3 多模态分析

多模态分析方法 (Multimodal Analysis) 是在社会符号学视角下,强调教材多模态符号模式分析及多模态意义建构 (Kress, 2010; Serafini, 2012)。该方法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同时关注语言学习者的多模态识读能力、课堂教学活动的符号化等相关研究。近年出现了通过语言教材图文关系分析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的研究 (Gulliver, 2010; Stranger-Johannessen, 2015; Chapelle, 2016)。

综观国内对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研究,从分析方法看,有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对不同教材的对比分析 (张虹, 2020),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分析方法的研究较少,而且主要发表在国际期刊。运用多模态或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代表性研究有:Feng (2019) 以多模态认知评价分析框架分析了 19 种香港英语教材的社会价值观表征及个体发生学的发展变化态势;Xiong & Peng (2021) 通过分析教材图文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对比了两套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价值表征特点。后续我国学者可以加强基于多种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研究。

## 4 外语教材文化研究、文化教学与教材建设面临的挑战

在外语教材建设和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文化教学在内容选择与构成上需要系统的理论体系参照,避免随机性与片面性。教材编写者、教师和学生需要具备或发展辨别文化素材、社会文化情境和价值取向的能力,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提供了系统分析的工具和理论参考。结合多种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外语教材文化资源内容组织、教学实施和教材建设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 4.1 国家战略发展与外语文化教学的关系

从长期来看,需要把国家战略发展从文化的视角着手纳入语言教学的视域。从图 1 的文化类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主要属于外围圈和外扩圈。我国外语教材在加大中华文化占比的同时,需要适当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征及其占比,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

### 4.2 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教材文化内容虽然越来越多地涉及多元文化事实、观念或观点,呈现逐渐向文化全

球化定位的转变,但是目标语文化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英语是连接民族与全球的中介,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具备国际理解力 (包括各种类型文化的理解)、国际传播力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和国际领导力 (参与国际事务治理) 等能力。

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及民族和国家文化身份认同是文化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外语教学中的本土文化学习使学生在互动和意义协商中构建个体民族文化身份,并基于国际理解力在国际社会中传播中华文化。同时,语言学习者从本土文化视角思考、比较、评判和欣赏目的语文化和国际文化。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在国际化进程中最终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因此,外语教材文化内容与教学需要实现对内构建公民的民族身份,对外构建国际化公民属性的双重功能。

### 4.3 个体主题与国家社会宏大主题的关系

文化不只是宗教、艺术、人文等群体文化的宏大主题,还包括与个体文化相关的微小主题。外语教材的文化析出与融入以及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均需平衡宏大主题与个体主题的关系。在文化维度和文化主题等层次同样需要平衡大 C 文化和小 c 文化的比例,注意抽象宏大主题与具体个体主题的分布与融合。Moran (2001) 的五个维度中的“人物”不只代表个体文化,同时暗示了该人物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历史背景,而且个体文化相关的生动鲜活的文化主题能够更好地引起语言学习者文化学习中的情感共鸣和形成认知接受。

### 4.4 教材文化呈现与学习者文化意义建构的关系

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主要是文化意义潜势,需要学习者基于教学活动设计与教师、教材和同伴产生互动,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实现文化意义协商和建构。对于教学材料中蕴含的相关文化元素,学习者在文化隐性教学中习得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和技能,而不是语言材料隐含的文化。研究发现,教材中隐含文化意义的文本、图片对学习者的主要产生促进语言能力发展的作用;语言学习者的价值意义建构需要显性引导,教师需要通过教学活动引导语言学习者与图文信息进行认知互动才能实现文化意义建构;学习者的认知投入 (engagement) 是价值观发生转化的重要前提 (Weninger, 2013),对于实现文化教学的育人目标尤为重要。

因此,语言学习者的文化意义建构需要显性教学,

同时要充分重视教学活动设计,注意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借助教学材料培养文化反思和批判能力,促进有全球文化理解力、民族文化自信、国际传播力和国际领导力的人才的培养。

## 5 结语

外语教材文化分析及相关研究有利于坚持我国外语教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基于文化概念内涵和外语教材文化实证分析的内容分类框架,构建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能够为外语教材研究者、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教师和学生)提供教材综合分析或文化教学实施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提高外语文化教学价值引领实践成效,从教材文化建设的路径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基于以上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内容维度和分析方法,可以拓展我国外语教材文化分析的实证研究,如具体分析某种外语教材已经呈现的文化内容,需要更多呈现的文化内容,呈现这些文化内容的原因等。对以上内容研究,需要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学习者个体发展的实际出发,并顺应外语教材分析理论视角的社会文化转向趋势。另外,外语教材文化分析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注意引入语言学理论,如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探究某一主题表征下的具体语言表达和意义实现手段。□

## 参 考 文 献

- [1] Adaskou, I. L., Britten, D. & B. Fahsi. Design decisions on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a secondary English course for Morocco[J]. *ELT Journal*, 1990(1).
- [2] Bahrami, N. Evaluat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an in-use EFL textbook[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2015(3).
- [3]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9.
- [4] Chapelle, C. A. *Teaching Culture in Introductory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5] Cortazzi, M. & L. X. Jin. Cultural mirr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e EFL classroom[A]. In Hinkel, E. (ed.).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Dastjerdi, H. V. & S. H. Samian. Quality of Iranian EFL learners' argumentative essays: Cohesive devices in focus[J].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2).
- [7] Dweik, B. S. & S. W. Al-Sayyed. Analysing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action PACK 12[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Research*, 2015(3).
- [8]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Longman, 1995.
- [9] Feng, W. D. Infus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 ontogenetic analysis of social values in EFL textbooks in Hong Kong[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9(4).
- [10] Graves, K. Recent books on language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J]. *ELT Journal*, 2019(3).
- [11] Gulliver, T. Immigrant success stories in ESL textbooks[J]. *TESOL Quarterly*, 2010(4).
- [12] Kachru, B. B. World Englishes: Approaches, issues and resources[J]. *Language Teaching*, 1992(1).
- [13]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J]. *AILA Review*, 1998(1).
- [14] Kress, G.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14).
- [15] Liu, 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s in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5(1).
- [16] Moran, P. R.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Boston: Heinle & Heinle, 2001.
- [17] Porreca, K. Sexism in current ESL textbooks[J]. *TESOL Quarterly*, 1984(4).
- [18] Serafini, F. Reading multimodal texts in the 21st century[J].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2012(1).
- [19] Shin, J., Eslami, Z. R. & W. C. Chen. Presentation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J]. *Language, Culture & Curriculum*, 2011(3).
- [20] Song, H. D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ominance in Korean EFL textbooks[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013(4).
- [21] Stern, H. H.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2] Stranger-Johannessen, E. Constructing English as a Ugandan language through an English textbook[J]. *Language, Culture & Curriculum*, 2015(2).
- [23] Su, Y. C.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English for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Taiwan's high school EFL textbook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3).
- [24] Tajeddin, Z. & S. Teimournezhad. Exploring the hidden agenda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ised ELT textbooks[J]. *The Language Learning*

- Journal, 2015(2).
- [25] Wang, D. Learning or becoming: Ide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extbooks for international learners of Chinese [J]. *Cogent Education*, 2016(1).
- [26] Weninger, C. & T. Kiss. Cultur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textbooks: A semiotic approach [J]. *TESOL Quarterly*, 2013(4).
- [27] Weninger, C. Textbook analysis [A]. In Chapelle, C. A.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Hoboken: Wiley & Sons, 2018.
- [28] Xiong, T. & Y. Peng. Representing culture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A critical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J]. *Language, Culture & Curriculum*, 2021(2).
- [29] Xiong, T. & Y. Qian. Ideologies of English in a Chinese high school EFL textbook: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2(1).
- [30] Xiong, T. & Z. Yuan. It was because I could speak English that I got the job: Neolibe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English textbook series [J].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018(2).
- [31] Yamada, M. English as a multicultural language: Implications from a study of Japan's junior high schools'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10(5).
- [32] Yuen, K. M.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in English textbooks [J]. *ELT Journal*, 2011(4).
- [33] 郭宝仙. 新时代英语教材的文化使命及其实现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9).
- [34] 刘建达.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外语课程改革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 [35] 陆道坤.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研究进展、难点焦点及未来走向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 [36] 孙有中.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 [37] 王攀峰. 教科书内容分析的类型学研究 [J]. 教育科学, 2020(1).
- [38] 张虹. 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0(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1 年度课题项目“外语教学智慧思政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113685) 的阶段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21-10

通讯地址: 510006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杨;汪;通讯作者)

## 《外语电化教学》关于启用在线投稿系统的启事

为了方便广大作者投稿, 提高本刊编审效率, 抑制不法之徒盗用我刊身份诈骗作者钱财的现象, 本刊编辑部已于 2016 年 3 月正式启用网络在线采编系统, 同时废止过去的所有投稿电子邮箱, 也不再接受打印稿。

本刊在线投稿系统网址为:

[www.wydhjx.cbpt.cnki.net](http://www.wydhjx.cbpt.cnki.net), 也可扫描右方二维码进行投稿。

提示: 四个月内未收到编辑部稿件处理回复, 默认为自动退稿。



本刊投稿二维码

《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

2022 年 6 月

## O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EFL Textbooks: Content,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YANG Dongling & WANG Dong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factors in English textbooks influence the language learners'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deology,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udy of cultural content in Chinese English textbooks is still at a relatively immature stage of phenomenon interpretation,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ed supporting theories and framing methodologies to achiev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and rai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ultural content in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based on the broad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analysis that has been frequently used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Asian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previous framework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hierarchical framework for cultural analysis of English textbooks consisting of three levels: type, dimension, and theme. At the macro level, the type layer encompasses Cortazzi & Jin's target culture, sourc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Kachru's inner circle, outer circle and expanding circle. At the micro level, the theme layer includes Byram's and Dweik & Al-Sayyed's list of evaluation criteria. In between is the dimension layer at the meso level which includes Stern's big "C" and small "C" cultures, and Moran's product, practice, perspective, community and person, and Adaskou *et al.*'s aesthetic, sociological,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enses.

The type layer helps to interpret cultural content from an outsider's perspective. The dimension layer is relatively abstract and helps users develop cultural awareness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meaning or value. The theme layer is the most concrete and diverse level, which is easy to depict, but difficult to structure or generalize.

This hierarchical framework helps to interpret cultural content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nd is in line with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national values. It also helps to further cultural studies in English textbooks and promote a worldwide shift from language studies to socio-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ield.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SFL theories, social semiotic theor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ies, content analysis, multimodal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re the thre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strands of cultural analysis. These three approaches are elabora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corresponding cultural content and representational studie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key pairs of relationships that challenge the cultural analysis in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and the cultur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ong-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vs. cultur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ationalism vs. internationalism; personally relevant micro-topics vs. national/social macro-topic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EFL textbooks v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aning for language learners.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can inspire researchers, composers, and users of EFL textbook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EFL Textbook; Cultural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Culture Education;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